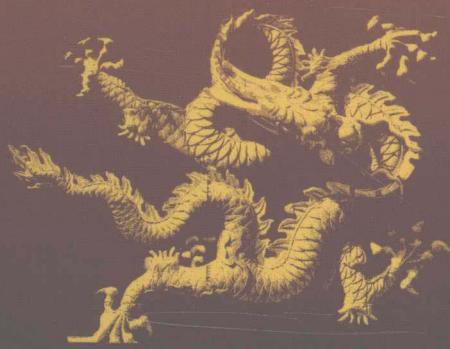


论中国古代的 历史总结与国家盛衰

庞天佑 著



中国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论中国古代的

历史总结与国家盛衰

庞天佑 著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论中国古代的历史总结与国家盛衰/庞天佑著.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2.1

ISBN 978-7-5161-0013-4

I. ①论… II. ①庞… III. ①中国历史：古代史—研究
IV. ①K220.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1) 第 1711012 号

责任编辑 史慕鸿

责任校对 郭 娟

封面设计 毛国宣

技术编辑 李 建

出版发行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鼓楼西大街甲 158 号 邮 编 100720

电 话 010—64073836 (编辑) 64058741 (宣传) 64070619 (网站)
010—64030272 (批发) 64046282 (团购) 84029450 (零售)

网 址 <http://www.csspw.cn> (中文域名：中国社科网)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君升印刷有限公司 装 订 廊坊市广阳区广增装订厂

版 次 2012 年 1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2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880×1230 1/32

印 张 10.625 插 页 2

字 数 263 千字

定 价 32.00 元

凡购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图书，如有质量问题请与本社发行部联系调换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序

人类社会的历史，沿着从过去到现在再到未来的方向，永不停息地向前延伸。在不断延续与无限发展的过程中，沧海桑田，物转星移，盛衰祸福，瞬息即逝。前人的活动为后人的实践提供了基础与条件。这种基础与条件一方面成为后人从事新的历史创造的前提，一方面则又是其进行各种实践活动的起点。华夏先民虽然没有也不可能认识到历史的一维性与无限性，更不可能认识到历史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必然性；但从历史的发展中朦胧地意识到，历史的延续并非总是笔直而平坦的，而是存在着形形色色的激流险滩，充满着各种各样的回流与曲折。吴怀祺先生言：如果历史的发展没有重复，那么历史的借鉴也“无从谈起”；如果历史的发展只有重复，那么历史的借鉴“只是一种刻板地照搬前人的作法”。历史的发展“既是不可重复的，又有重复的东西在起作用”。^①远古时代的华夏先民逐渐萌发出历史意识，进入文明时代以后形成了重视历史总结，借鉴前代成功的经验，吸取前人失败的教训，不断地开拓前进的道路的传统与精神。先王之道与前朝之事之所以可为后人提供借鉴，是因为历史借鉴常常

^① 吴怀祺：《历史借鉴与当代社会的发展》，《北京师范大学学报》1996年第3期。

能够纠正时下的错误。如果了解以往各种事件的来龙去脉，把握其前因后果之间的联系，那么在现实中处理类似问题的时候，借鉴成功的经验就能获得预期的效果，而抛弃错误的行为则可以避免失败的重演。

中华民族有着辉煌的历史，也曾经历尽沧桑，但绝不沉迷过去，更不是向后看，而是立足现实而清算历史，为了明天而反思昨天，面向未来而总结过去。殷商灭亡以后，周公总结商纣灭亡的教训，提出敬天保民的治国理念；西周统治者将其贯彻于治国实践，形成成康之治的盛世局面。秦朝灭亡以后，汉初思想家反思秦亡的原因，提出因顺自然、无为而治的治国主张；西汉统治者将其运用于施政实践，轻徭薄赋，与民休息，形成文景之治的盛世景象。隋朝灭亡以后，贞观君臣反思隋统治者穷奢极欲、横征暴敛的教训，凝聚为成熟而完备的君道理论，在施政中不忘以隋为鉴，以清静为务，创造了贞观之治的太平盛世。元朝被推翻以后，明初统治者吸取元末暴政导致天下乱亡的教训。朱元璋言：“一代之史，务直述其事，毋溢美，毋隐恶，庶合公论，以垂鉴戒。”^①他采取许多措施，恢复经济，发展生产，减轻民的负担。明朝灭亡以后，清前期统治者注意以明为鉴。康熙宣称：“凡明体达用之资，莫切于经史。其为治道之助，良非小补也。”^②其治国施政重视历史经验，减轻民的负担，形成长达百年的康乾盛世。魏源有言：“欲识济时之要务，须通当代之典章；欲通当代之典章，必考屡朝之方策。”^③这些事例说明，中国古代的历史总结与国家治理，密切联系在一起。我认为，以史为

^① 《明太祖实录》卷三十九，台北“中研院”1962年版。

^② 《清圣祖实录》卷一百一十九，中华书局1985年版。

^③ 魏源：《皇朝经世文编五例》，《魏源集》上册，中华书局1976年版，第160页。

鉴、瞩目未来的传统与精神，是中华民族极为宝贵的精神财富，对于我们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具有重要的意义。

研究中国古代政治家、思想家及史学家的历史总结，探讨其对于国家治理的影响及与国家盛衰的关系，不仅具有极为重要的学术价值，而且有着现实的借鉴意义。历史的延续要求后人认真反思前人的活动，不断总结前人的经验教训，深刻认识自己的时代环境，把握历史与现实的内在联系，在前人的基础上进行新的创造活动。在远古时代，华夏先民认识到恪守前人传统、铭记先祖训诫的必要性。在中国古代社会里，许多高瞻远瞩的统治者关注盛衰问题，吸取前人的经验教训；而思想家与史学家则通过总结历史，为统治者治国兴邦提供借鉴。华夏哲人既认识到盛世能够为后人提供成功的范例和宝贵的经验，因此极为注意从盛世中总结经验；更意识到灾难与失败可以激励意志，振奋精神，催人奋起，凝聚国魂，因而特别重视从灾难与失败中吸取教训，形成了重视历史、总结历史的传统。因为前人的经验与教训对后人的实践具有深刻的鉴戒与启示意义，所以中国古代的历史总结与国家治理有着极为密切的关系。从铭记历史、以史为鉴到以史明义、教化世人，从总结历史、以史资治到以史经世、探讨治道，历史总结为治国兴邦服务，史学的政治功能得到充分的发挥，史学的社会价值得到有效的实现。

我在长期从事中国古代史学理论及中国史学史的教学与研究的过程中，深入思考中国古代的历史总结与国家盛衰问题；在广泛涉猎儒家经典、周秦诸子、历代正史，以及其他历史典籍的基础上，大量搜集各类原始材料，认真探讨与分析这些材料，从中引出自己的结论，以期对历史盛衰问题的研究有所推进。在吴怀祺先生指导下，我完成了《中国史学思想通论·历史盛衰论卷》，发表了多篇探讨中国古代的历史总结与国家盛衰的学术论文。本

4 / 论中国古代的历史总结与国家盛衰

书收入的十二篇文章，论述的中心紧紧围绕中国古代的历史总结与国家盛衰问题展开，虽然涉及从上古时期到明清之际乃至中国近代，有对中国古代一些重要历史时期盛衰总结的整体考察，也有对一些重要思想家、史学家历史盛衰思想的个案研究，但突出随着社会发展进步，各时期盛衰思想的特点，构成彼此联系的体系。我力求不落俗套，不固陈见，大胆开拓，追求创新，不人云亦云，不空发议论，在继承前人的基础上，发前人之所未发，为中国史学的繁荣作出贡献。

目 录

论儒家经典的历史总结	(1)
一 儒家经典历史总结的渊源	(1)
二 儒家经典历史总结的特点	(8)
三 儒家经典历史总结的影响.....	(15)
论周秦诸子的历史认识	(24)
一 周秦诸子历史认识的基本特点	(25)
二 周秦诸子历史认识的理论价值	(32)
三 周秦诸子历史认识的主要局限	(48)
论秦亡汉兴的历史总结	(55)
一 秦亡汉兴历史总结的社会背景	(56)
二 秦亡汉兴历史总结的主要特点	(59)
三 秦亡汉兴历史总结的基本结论	(70)
四 秦亡汉兴历史总结的重要意义	(78)
论董仲舒的历史盛衰考察	(84)
一 综观天人考察古今社会	(85)
二 变而有常与不常之变	(90)

三 循环与进化融为一体	(95)
四 量变与质变有机统一	(99)
五 以史为鉴与治国兴邦	(103)
论司马迁通古今之变的深刻意蕴 (110)	
一 通变思维与原始察终	(110)
二 盛衰互变与见盛观衰	(116)
三 进化与循环彼此渗透	(121)
四 应天承命与以民为本	(126)
五 顺势从事与兴亡成败	(132)
论魏晋南北朝的历史兴亡考察 (138)	
一 天命迷信与国家兴亡	(138)
二 社会人事与盛衰成败	(146)
三 历史总结与治国方略	(152)
四 政治环境与历史认识	(161)
论贞观年间的历史鉴戒思潮 (168)	
一 设馆修史,取鉴资治	(169)
二 总结历史,大兴文治	(174)
三 铭记史鉴,治国兴邦	(183)
四 拨乱反正,创建盛世	(192)
杜佑的“征诸人事,将施有政”思想发微 (203)	
一 从以史为鉴到以史经世	(204)
二 施政总结与时代要求	(209)
三 理论意义与哲学思维	(213)

论宋代学者历史总结的旨趣	(218)
一 纵观古今成败,探寻沿革之迹	(219)
二 总治治国之道,服务施政兴邦	(224)
三 察究治乱之原,因应盛衰之运	(230)
论明清之际历史总结的批判精神	(234)
一 动荡的环境,崩解的社会	(235)
二 天下大害,“君而已矣”	(240)
三 “明体适用”,“匡时”“救世”	(247)
四 力诋空言,主张实学	(254)
五 “博赡”“通贯”,严密实证	(261)
六 “明著法戒”,“垂训方来”	(268)
论君主行为、道德与社会风俗及国家盛衰	(275)
一 君主行为影响社会风俗	(276)
二 君主道德攸关国家盛衰	(285)
三 君主树德有利国运长久	(295)
论因时通变与历史盛衰	(304)
一 “通其所穷,疏其所壅”	(305)
二 “与时迁徙,与世偃仰”	(310)
三 审时度势,建功立业	(314)
四 因时通变,开创未来	(320)
主要参考文献	(325)

论儒家经典的历史总结

儒家为诸子之祖，是周秦诸子中最早兴起的思想流派。西汉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儒学从子学变为经学，逐渐成为中国文化的核心。在中国古代历史上，儒家经典所包括的典籍尽管有过某些变化，但《周易》《尚书》《诗经》《周礼》《仪礼》《礼记》《春秋》及《公羊传》《穀梁传》《左传》等，从汉代以来一直是人们研习儒家思想的主要经典。这些儒家经典的作者虽然多不可考，而具体内容又各不相同，但都以上古或者西周、春秋时期的社会作为关注点，从不同侧面反映天下的盛衰与社会的变化，寓含以史为鉴、治国兴邦的深刻理念。我认为，儒家经典以历史盛衰总结为主要内容，强调人们必须以史为鉴，满怀深沉的忧患意识，蕴涵对于宇宙自然与人类社会的深刻见解，不仅具有极高的史料价值，而且有着重要的思想价值。

一 儒家经典历史总结的渊源

儒家经典中的多数典籍，是华夏先民在上古时代漫长的历史过程中，逐渐形成的，“非一时代一作者之产物”。^① 其作者

^① 陈寅恪：《冯友兰〈中国哲学史〉上册审查报告》，《金明馆丛稿二编》，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版，第248页。

不同而内容广泛，涉及从上古至春秋时期的国家兴衰、社会生活、思想文化、政治制度等。《周易》虽然是一部以华夏先民占卜为主要内容的典籍，但却反映出上古时代对政治、经济、思想、文化、伦理及个人命运等方面的认识，表现出对宇宙自然与人类社会的深入思考，渗透着通变趋时、革故鼎新的人文精神，对后来人们认识历史的方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诗经》是一部广泛涉及从西周到春秋时期社会生活的诗歌总集，展现出这一历史时段的政治经济、思想文化、民情风俗、生活习惯等，反映出从上古到春秋时期的社会状况与历史盛衰；《尚书》作为上古史官保存下来的“政事之纪”，^①包含对前代盛衰兴亡的深刻总结，从中可以考察先王兴教治化、日新其德的经世大略，贯穿着强烈的以史为鉴、治国兴邦的施政理念；《周礼》《仪礼》《礼记》合称《三礼》，汇集了先秦时期关于国家管理的各种典章制度，反映出这些典章制度的内容与沿革；《春秋》按照年代的顺序，记载上起公元前 722 年，下到公元前 481 年共达二百四十二年的史事；《公羊传》《穀梁传》《左传》被称为《春秋》三传，其内容或阐释《春秋》的微言大义，或补充上古及春秋时期许多史实。《庄子》称：“《诗》以道志，《书》以道事，《礼》以道行，《乐》以道和，《春秋》以道名分。”^②庄子虽然是强调儒家经典各自的作用，但也说明这些经典的内容反映了上古时代的历史。故司马迁编撰《史记》，“厥协六经异传，整齐百家杂语”，^③不仅以儒家经典为史料，考察从上古以来到西汉的历史盛衰；而且以儒家思想为理论，评论历史人

① 王先谦：《荀子集解》卷一《劝学篇第一》，中华书局 1954 年版，第 7 页。

② 王先谦：《庄子集解》卷八《天下第三十三》，中华书局 1954 年版，第 216 页。

③ 司马迁：《史记》卷一百三十《太史公自序》，中华书局 1973 年版，第 3319—3320 页。

物与历史事件。

儒家经典总结历史盛衰，蕴涵强烈的以史为鉴的思想。这种思想源远流长，其渊源可以追溯到上古时代。班固宣称：“儒家者流，盖出于司徒之官，助人君顺阴阳明教化者也。游文于六经之中，留意于仁义之际，祖述尧舜，宪章文武，宗师仲尼，以重其言，于道最为高。”^① 班固之语包含四层含义：一是说明儒家学派的历史渊源，出自上古时代“司徒之官”；二是指出儒家思想“留意”“仁义”，阐述纲纪伦常之道，目的是“助人君顺阴阳、明教化”；三是揭示儒家六经“祖述尧舜，宪章文武”，传承从尧舜之道到文王、武王的思想，有着以史为鉴的重要作用；四是认为儒家学派由孔子创立，在治国之道中“最为高”。在原始氏族社会中，华夏先民繁衍生息于因为血缘宗族关系而形成的封闭狭窄的环境中，从事采集渔猎到原始农业生产活动，日出而作，日入而息。这种简单的农业生产与单调的生活方式，不仅使先民的认识能力极为低下，而且决定了他们在思想上与行动上谨守传统，导致了对于父系先祖的尊敬与崇拜，形成了“万物本乎天，人本乎祖”的思想意识。^② 在华夏先民从野蛮走向文明的过程中，原始氏族社会的历史遗存大量存在，氏族机构演变为国家机器，父系家长蜕变为国家统治者，血缘关系继续保存下来，宗法制度得以长期延续，形成了遵循历史传统，以先祖教诲为行为准则，尊奉尊敬先祖的人文精神。这种追溯往迹、追念先祖、尊奉长辈、恪守训诫的传统，是一种氏族社会的遗风。《尚书》称尧在位期间，“允恭克

^① 班固：《汉书》卷三十《艺文志》，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1728页。

^② 郑玄注，孔颖达正义：《礼记正义》卷二十六《郊特牲第十一》，《十三经注疏》下册，中华书局1980年影印本，第1453页。

让，光被四表，格于上下。克明俊德，以亲九族。九族既睦，平章百姓，黎民于变时雍。”^① 这就是说，尧具有信义、恭谦、克制、礼让等优秀品质，其光辉广泛地照耀于四海之内，甚至普及于天地之间。他明察秋毫而贤才兼备，以自己的行为亲近各族百姓。各族百姓既能和睦相处，又能明辨是非。百姓所视明白，平和天下各国，随着尧的德行而化，风俗大变。《尚书》的记载表明，在父系氏族社会晚期，尧这位德高望重的氏族领袖，作为氏族最高权威和统治者，深受人们尊奉与拥戴。这种敬奉先祖、恪守训诫而不得违背的现象，发展成为一种社会认同的价值观念，积淀成为一种审视历史与现实的思维惯性，内化成为一种人们遵循的行为准则，演化成为一种历代相传的思想传统。《诗经》说：“祀事孔明，先祖是皇，报以介福，万寿无疆。”^② 又说：“念兹皇祖，陟降庭止。维予小子，夙夜敬止。”^③ 华夏先民进入文明时代以后，强调铭记先公先王的治国经验，敬奉先祖的意识极为强烈。天与先祖的神灵合一，先祖因为以德配天，才得到了天命眷顾；天命根据君主之德决定，所以君主应该以史为鉴而保有天命。

儒家经典总结历史、强调史鉴。这种思想是在远古时代崇拜先祖、恪守训诫的传统的基础上，随着从野蛮时代向文明社会过渡，不断积淀、不断深化而逐渐形成的。从黄帝，经尧、

^① 孔安国传，孔颖达正义：《尚书正义》卷二《尧典第一》，《十三经注疏》上册，第119页。

^② 毛亨传，郑玄笺，孔颖达正义：《毛诗正义》卷十三《小雅·信南山》，毛传认为《信南山》为刺幽王而发，幽王“不能修成王之业，疆理天下，以奉禹功，故君子思古焉”。《十三经注疏》上册，第470—471页。《诗经》中以历史讽喻现实的诗篇，数量颇多，举不胜举。

^③ 毛亨传，郑玄笺，孔颖达正义：《毛诗正义》卷十九《周颂·闵予小子》，《十三经注疏》上册，第598页。

舜，到夏、商之际，因为文字的创造与历法的制定，成文的历史记载取代了远古时代的结绳记事；从原始氏族社会沿袭而来的尊崇先祖、恪守古训的风气，演变成为总结盛衰兴亡的经验教训，以此作为治理国家借鉴的思想。黄帝时有仓颉、沮涌，虞舜时有伯夷，夏代有终古，这些史官承担着协助统治者治理国家的职责。殷商时期，敬宗法祖成为一种普遍的社会风气，殷墟卜辞中有关祭祀先祖者多达一万五千多条，其中关于上甲的一千一百多条，成汤的八百多条，祖乙的九百多条，武丁的六百多条，“敬奉先公先王，是商人的第一等要务”。^① 这些说明对于以历史作为治国施政的鉴戒，殷商时期人们的认识大大提高了。范晔言：“唐虞三代，《诗》《书》所及，世有史官，以司典籍。”^② 所谓“世有史官”，反映出上古统治者对于历史总结高度重视。王充言：“唐、虞、夏、殷、周者，土地之名。尧以唐侯嗣位，舜从虞地得达，禹由夏而起，汤因殷而兴，武王阶周而伐，皆本所兴昌之地，重本不忘始，故以为号。”他根据历史事实认定，上古朝代之名是从地名转化而来，而由地名发展到赞颂朝代的功德，反映出上古先民对先王业绩的肯定与追忆，对古代盛世的反思与总结。王充认为，《尚书》谓之有天下之代号，“唐、虞、夏、殷、周者，功德之名，盛隆之意也。故唐之为言荡荡也，虞者乐也，夏者大也，殷者中也，周者至也。尧则荡荡民无能名；舜则天下虞乐；禹承二帝之业，使道尚荡荡，民无能名；殷则道得中；周武则功德无不至”。^③ 孔颖达言：“伏羲、神农、黄帝之书，谓之三坟，言大

^① 冯天瑜：《中华元典精神》，武汉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217页。

^② 范晔：《后汉书》卷四十上《班彪列传上》，中华书局1965年版。

^③ 王充：《论衡·正说篇》，中华书局1954年版，第273页。

道也；少昊、颛顼、高辛、唐、虞之书，谓之五典，言常道也。”^① 孔颖达所说的大道，指的是盛衰兴亡的规律；而其所言的常道，则是指施政安民的法则。这说明华夏先民从远古时代就注意总结历史，把握盛衰之道，思考治国之法。

儒家经典总结历史盛衰，目的是以史为鉴，为治国兴邦提供经验教训，期待君主能够永远保有天命。《尚书》总结历史盛衰、主张以史为鉴的思想，非常突出，极为强烈。如《甘誓》是夏启前往讨伐有扈氏，在甘地出师时宣誓的誓词。在这篇誓词中，夏启强调：有扈氏“威侮五行，怠弃三正”，“天用剿绝其命”。这些誓言的大意是，有扈氏倚仗淫威，肆意凌辱五行，背弃天、地、人的正道，上天要我夏启断绝他的性命。如果说夏启的誓词主要是指责有扈氏背弃“三正”，那么商汤讨伐夏桀的誓词则不再是简单地指责其违背正道，而是包含着对于夏代历史的深沉反思与盛衰总结了。在《汤誓》中，商汤宣称：“有夏多罪，天命殛之。”“夏王率遏众力，率割夏邑；有众率怠，弗协，曰：‘时日曷丧，予及汝皆亡。’夏德若此，今朕必往。”这些誓言强调的是，夏桀犯下了累累罪行，上天命令我前往诛灭他。夏桀盘剥天下的百姓，非常残暴；故天下的百姓群起怠工，互相之间不能和谐。他们说：这个夏桀何日灭亡，我们与他共同灭亡。夏桀的德行到了这样的程度，现在我必须前往讨伐他。从这篇誓词中可以看到，商汤不仅谴责了夏桀的罪行，而且总结了夏代的历史教训。商王盘庚将对历史的总结与他的施政举措联系起来。《盘庚》载其迁都于殷，而“民不适有居”。盘庚强调：“先王有服，恪谨天命，兹犹不常宁，不常厥邑，于今五邦。今不承于古，罔知天之断命。矧

^① 孔颖达：《尚书序》，《十三经注疏》上册，第113页。

曰：其克从先王之烈。若颠木之有由蘖，天其永我命于兹新邑，绍复先王之大业，底绥四方。”盘庚认为先王管理国家大事，恭谨地遵从天命，兢兢业业而不敢放任，不以定居一地为安。自汤王建国以后，到现在已经迁移了五地。如果不遵循先王尊崇天命的传统，上天就将断送我殷商的国命。怎样才能继承先王的功业呢？在盘庚看来，如果国都从耿地迁移到殷，就能像已死之木得到复生，上天将使我继承的王命，在这新的都城里永远传下去，继承先王立国的伟大事业，从此稳定天下四方。盘庚不仅以商汤建国以后至其迁殷之前，总共五次迁都的历史经验为依据，说明他决定迁都的原因，强调迁都对于商的意义，说服其臣民接受迁都于殷的行为；而且反复指出治理国家，应该“古我先王”、“古我先后”、“古我前后”，即遵循先王的经验教训，作为治国施政的鉴戒。这类语言既说明了盘庚对于先祖的尊奉与崇敬，又反映出他以历史经验作为治国施政的借鉴。我们从《尚书》的《周书》可以看到，西周前期统治者从夏、殷两代的盛衰兴亡中，探讨恢宏至道，总结治国鉴戒，这种思想极为强烈。《泰誓》《牧誓》等篇章屡屡提到“古人有言曰”，要求以先祖古训为鉴戒。《康诰》《酒诰》《召诰》《多士》《多方》等篇章，记载周公总结夏、殷两代的经验教训，作为后人施政理民的鉴戒。他称：“人无于水监，当于民监；今惟殷坠厥命，我其可不大监抚于时。”^① 又言，“我不可不监于有夏，亦不可不监于有殷”，^② 告诫成王等注意宽仁待民，体恤百姓疾苦，了解稼穡艰难，勤劳国家政事。《诗经》

^① 孔安国传，孔颖达正义：《尚书正义》卷十四《酒诰第十二》，《十三经注疏》上册，第207页。

^② 孔安国传，孔颖达正义：《尚书正义》卷十五《召诰第十四》，《十三经注疏》上册，第213页。